

绪 论

2015年8月23日，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我国山东济南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向会议致贺信说：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

中国人自古重视历史研究，历来强调以史为鉴，我们的前人留下了浩繁的历史典籍。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应该尊重彼此的选择，加深彼此的了解，以利于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历史学家在这方面可以并且应该发挥积极作用……中国有着5000多年连续发展的文明史，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不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梦想，很难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需要博采各国文明之长。

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这种观点秉持华夏文明自古以来一贯注重史学的优良传统。认清历史有大功用，我国“历史学之父”司马迁对此有极其深刻精核的论述，《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说：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

① 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人民日报》，2015-08-24（1）。

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司马迁对《春秋》的赞美可谓无以复加，如果大家明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曾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作用，就知道太史公所言非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由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著、经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正式课本，于1938年出版。该书曾被誉为马列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百年总结，对苏联时期意识形态的塑造产生深刻影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建立联共（布）式的工人阶级政党及其思想理论基础和战略策略具有深远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末起，该书成为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重点推介的对象，一度成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经验的“范本”。

中华文明为何能延续5000年而不间断，这是值得探究的问题。文明形态学是一种重要的分析世界历史兴衰演变的宏观史学理论，其主张从文明而非阶级、宗教、民族或国家等角度来研究社会形态的变更，并在研究过程中加入史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文明形态论集大成者，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在12卷本巨著《历史研究》中，把6000年的人类历史划分为21种成熟的文明：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庭、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其中前6个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第一代文明，后15个是从第一代文明派生出来的亲属文明；另外还有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玻利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在这21个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传承至今的文明，汤因比认为人类未来的希望在于中华文化的复兴。

无独有偶，美国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也持相似观点。沃勒斯坦是现代化学理论世界体系派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现代世界体系》集中讨论三个主题，即世界体系的形成、运作及基本趋向，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新范式。他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说：

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为什么发端于西欧而不是中国……请允许我对于这一关键性的问题略述几点看法：

① 许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的推介及影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摘要。

第一，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资本主义是一剂危险的麻醉药，在整个历史上，大多数的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在最为虚弱的时刻对它屈服了。我们从此都在承受资本主义带来的后果。

第二，我们并非处于资本主义胜利时期，而是处于资本主义混乱的告终时期。遍及全球的反国家心态就是这种危机的一个主要症状，也是资本主义灭亡的催命剂。只要有众多的国家存在，资本主义就需要强化国家结构，不是像虚夸不实之辞所说的那样，要削弱它。

第三，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此前的大多数体系也是如此。当21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让位于后继的体系（一个或多个）时，我们将看看这后继体系是否会更平等。我们不能预测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但能通过我们目前政治的和道德的活动来影响其结果。

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中起重大作用。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中国是一切例外中的例外，逻辑到中国就行不通。中华文化无疑是世界历史上最独特的文化，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延续5000年而文化不曾中断的国家，除了我国本身的地理优势之外，还与我国文化的某些特质有密切关系。

中华文化特质何在？这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总结。中国立国数千年，迄今屹立不堕，应拜历史之赐。《春秋》所揭示的大一统之义，促使秦汉大一统的格局出现；秦汉以后，中国绝而复续者如缕，也受《春秋》大一统之义的影响；《春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则维持中国文明于不堕；继《春秋》而写的《新五代史》《资治通鉴》，使“干戈贼乱之世”的五代，进至有宋的文明；明末清初出现的《日知录》《读通鉴论》，持名教之论，中华赖以再造，世道借之复苏。历史大有造于中国者如此，所以到唐中叶，刘知几便立论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这是明快精当之论，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白指出历史有大功用的言论，值得国人深思。

法国启蒙运动著名经学者弗朗斯瓦·魁奈说：“历史学是中国人一直以其无与伦比的热情予以研习的一门学问。没有什么国家如此审慎地撰写自己的编年史，也没有什么国家这样悉心地保存自己的历史典籍。”作为他者的魁奈可谓目光如炬，其见解鞭辟八里，重视历史正是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显著特征。“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这是中国古代史官为保存历史而弃国出奔的事实。君主昏暴，国

①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罗荣渠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序言。

② [法]弗朗斯瓦·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谈敏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7页。

事已不可为，而历史不能亡，宁携历史以出奔。历史如此被珍重。到宋、元之际，出现“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史学观念。在我国古人看来，历史即等同于国运。

自古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都重视修史，即便是普通乡村一般也会细心地编纂和珍存自己的族谱。国学大师钱穆对我国史学特质有更为详细的概括：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二者“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三者“详密”。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二曰纪传，三曰纪事本末。其他不胜备举。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钱穆所言并非夸大其词。刘知几把唐代以前的历史著作分作六类：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但统归于二体。丘明传《春秋》为编年之祖，子长著《史记》为纪传之祖，故编年、纪传二体，未可轩轻。在唐代之后，随着新史书的涌现，它们的分类也越来越细致。清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丛书，其中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目录类、史评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等共 15 大类，蔚为壮观。

与《四库全书》古法分类不同的是，当代有学者按体裁来对史学进行归类，把它们分为九种：（1）编年体：它的具体特点是以年为主，以事系于年月。（2）纪传体：它以人为主，记一人或同族、同地域、同类型的人物事迹。（3）本末体：它以记事为主，列叙其源流始末。（4）典志体：它主要叙述政体官制及各种典章制度。（5）会要体：主要记述朝代沿革损益制度，以及“官员内有识量、忠谏、举贤、委任，崇奖”事迹等。（6）谱系体：它主要是记世系、宗族，人物年谱。（7）方志体：它是一种地方编纂的当地史书，内容驳杂。（8）其他史体：如种种专史、通史、当代史、实录、纲目等。（9）注史与补史。

注重历史编纂是我国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动力之一。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中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学专业大学生，应当责无

①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引论第 1 页。

② 李时：《国学问题五百》，天津古籍书店 1986 年版，第 41-42 页。

③ 刘少泉：《人文科学要论》，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81-186 页。

旁贷地继承发扬研究和阐述历史的优良传统。

撰写学术论文是大学生必须具备的能力。撰写史学论文是大学历史学专业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和训练学生搜寻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按培养计划规定，除学习专业知识之外，本科学生一般在三年级要完成学年论文，四年级要完成毕业论文（学士论文）；有条件有能力的同学，还应该参加学术研讨会，提交学术论文，并争取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

开设史学论文写作课程，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并非无的放矢。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要把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重视这个问题。大体上说，撰写一篇历史论文，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确定研究方向；搜集整理资料并且反复地研究和消化这些资料；构思论文的表述形式和方法，即考虑如何通过论文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表述出来；拟定提纲，实际上是确定论文的结构和论述层次；撰写，修改，定稿。构思论文的表述形式和方法，以及拟定论文的提纲，这对于写好论文来说很关键。作者要考虑好这篇论文的开头，即“前言”，定下它的结构，即叙述层次和逻辑，还要使之既展得开，又能时时围绕着论文的中心而不跑题，最后写好论文的结尾。人们常说一篇好的文章要“凤头、猪肚、豹尾”，这同样适用于历史论文。一篇好的历史论文必须开头就点破主题、吸引读者，中间内容丰富、论述深刻，具有说服力，结尾要有力量，结论鲜明，毫不含糊。

本书主要介绍论文写作的一些基本方法和基本学术规范，尽可能通过分析讲评一些范例来加深理解，其中也结合了笔者个人的实践经验。当然，史学论文写作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要真正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除了选修课程外，还要自己多多实践，要靠自己动手去写，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实践，才会不断提高。

第一章 史学论文概论

美国媒介人士黎曼·阿伯特(Lyman Abbott)晚年撰写回忆录,说他父亲临死时说,人间所有教会的争执、宗教的争执,90%都是名词之争;而他发现他父亲数学不好,原来最后那10%也是名词之争。概念界定的重要性不惟在宗教领域如此,在一切领域都极其重要。

《论语·微子》记载: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礼记·大学》也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上述引文即著名的儒家基本教旨“三纲领,八条目”,其原初起点即为格物。《大学》所说的格物,与孔子所说的正名一样,指的都是概念界定和事物分类。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科,程也。从禾从斗。斗者,量也。”科学的“科”字,其本意即有衡量、品级、分类、定标等含义。只有先科学地格物——早期佛教典籍翻译中的格义也类似于此,才能有明晰的概念,才能获得正确的知识,其他活动才能够顺利地展开,否则必定要遭到挫折厄难。

从黎曼·阿伯特、孔子和《大学》所言可知,概念界定是一切科学活动良性进行的开端,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尤其重要。概念若含混不清,将导致歧义纷呈,学术争鸣将变为鸡同鸭讲。下面将对本书重要的两个核心概念史学和论文稍做阐释。

第一节 史学性质

许多常用名词在学术研究中都有丰富的含义，这些概念在专业语境与普通语境中往往有很大的差别。史学，亦称“历史学”，通常称作“历史”。历史一词含义丰富，但主要有三重含义：第一，是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指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过程，相当于英文的 Being。第二，是作为门派“学科”的历史。学科的英文是 discipline，源自信徒、弟子 disciple，其最初的含义是门派知识。科学的英文是 science，来自拉丁文 scientia，意思是“knowledge”（知识），意思是以可检验方式建立和组织起来的关于世界的系统知识。史学即指对人类社会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第三，是作为手段“技艺”的历史，即对事件记录和研究的方法。本书讨论的主要是作为学科的历史，它在三者之间起着枢纽链接的作用，将作为客观存在和手段技艺的历史与自身联系起来。隶属于历史学或与之密切相关的学科有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编纂学、版本学、目录学、家谱学、年代学、考古学、地理学、社会学和新闻学等学科。

一、史学的相对性

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既非先天即有，亦非孤立存在。想知道什么是历史，先明白什么不是历史，这或许不失为一条可取之道。史学概念的界定与知识分类紧密相关，而知识分类主要有图书分类和学科分类两种。

图书分类又叫文献分类。我国汉代刘歆将皇家所有藏书分作六类，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在这之首冠以总目辑略，总称“七略”。自晋代初期开始，古人把所有文献分为四大类，即众所周知的经史子集。这种分类法始于晋代初期。荀勖、张华等，编列晋皇室所藏书籍，分为四部。及晋移江左，藏书淆乱，李充删除繁重，虽仍分四部，而内容稍异于前。于是甲部为五经之属，乙部为史记之属，丙部为诸子之属，丁部为诗赋之属。及至唐玄宗时四海晏然，于东西二都，各聚四部之书，将经、史、子、集分藏于四库之中。四大类别从此确定，四库之名喧腾人口，且流传于后世矣。经史子集的分类法在《四库全书》编定时获得钦定的政治地位。

在古希腊，柏拉图曾把知识分作辩证法、物理学和伦理学三大类，亚里士多德把知识分作理论的哲学、实践的哲学和创造的哲学，伊壁鸠鲁把哲学分作物理学、规范

① 李时编，《国学问题五百》，天津古籍书店 1986 年版，第 1 页。

② 李时编，《国学问题五百》，天津古籍书店 1986 年版，第 1 页。

学和逻辑学。到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把知识画面划分为诗歌、历史学、哲学三大领域，由想象、记忆和理解这三种能力所驾驭。所谓记忆主宰着历史学，也就是说历史学主要工作是以具体事实（就像它们实际上所发生的那样）在追忆和记录过去。在培根的基础上，笛卡尔增添第四项：神性学。笛卡尔的知识四分法可谓与我国古人的四分法不谋而合，相互辉映。

笛卡尔说，诗歌更多的是一种天赋而不是一种学问；神性学有赖于对启示的信仰；历史学则不论是多么有趣和富有教育意义，不论对于生活中的实践态度的形成是多么有价值，却不能自命为真理，因为他所描述的事件从来都不是准确地像它所描述的那样发生的。和中国古代的分类法相比，培根和笛卡尔的分类法具有一种相对的客观标准，根据作为研究活动主体的人的认识特点而归类。《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目录如下：经部为经学及文字训诂学，包括易、书、诗、礼（周礼、仪礼、礼记、三礼通义、通礼、杂礼书）、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训诂、字书、韵书）；史部为史志及地理志，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类）、史抄、载记、时令、地理（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职官（官制、官箴）、政书（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营建）、目录（经籍、金石）、史评；子部为诸子及兵医农等各家以及佛道典籍，包括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推步、算书）、术数（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艺术（书画、琴谱、篆刻、杂技）、谱录（器用、食谱、草木虫鱼、杂物）、杂家（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类书、小说家（杂事、异闻、琐语）、释家、道家；集部为诗、文，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词集、词选、词谱、词韵、南北曲）。由此可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与笛卡尔的分类法有强烈的对应关系。

进入近代社会之后，随着人们对世界更广泛更深入的了解，知识分类也越来越细致。图书分类法是按照图书内容的学科性质或其他特征将馆藏图书予以揭示并分门别类组织排列的一种手段。例如，国内普遍使用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将所有的文献分为五大基本部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性图书。五大基本部类下又包含 22 个大类，历史、地理并列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大类。

学科分类法是当前另一种运用广泛的知识分类法。学科是指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具有某一共同属性的一组学科则称为学科群。中国周代即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分，作为对学生训练教学的途径。学科分类的制定标准是依据学科研究对象、研究特征、研究方法、学科的派生来源、研究目的和目标等五方面来进行划分。这种分类法的编制原则的标准是：所列学科应具备其理论体系和专门方法的形成；有

① 参见陈克晶、吴大青，《科学分类问题》，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0 年版。

②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01 页。

③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02 页。

④ 丁雅娴主编，《学科分类研究与应用》，中国标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 页。

关科学家群体的出现；有关研究机构和教学单位以及学术团体的建立并展开有效的活动；有关专著和出版物的问世等条件。这个标准将所有的知识体系分为 58 个一级学科，每个一级学科下面延展地包含若干个二级学科和三级学科。这些学科归类为如下五大学科群：A. 自然科学，B. 农业科学，C. 医药科学，D. 工程与技术科学，E. 人文与社会科学。

五大学科群分别包含着数量不等的一级学科。其中人文与社会科学下面有 19 个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军事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教育学，体育科学，统计学。历史学是这 19 个一级学科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在内的其他许多一级学科，都有一个二级学科或三级学科是它的专业史研究，如物理学的第一个二级学科就是物理学史。

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 19 个一级学科中，考古学被公认是从历史学中脱离出来的一个分支，甚至到现在其博士所授予的学位仍是史学学位。其他有些学科其实也与历史学有很大联系。例如新闻学，蔡元培就说：“余惟新闻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之新闻中记某某之谈话若行动乎？《不修春秋》录各国报告，非犹今新闻中有专电通信若译件乎？由是观之，虽谓新闻之内容，无异于史可也。”毫无疑问，蔡元培把新闻看作历史派生出来的分支。

社会学与历史学也有很大关系。英国学者彼得·伯克认为，社会学可定义为单数的人类社会的研究，侧重于对其结构和发展的归纳；历史学则不妨定义为对复数的人类社会的研究，侧重于研究它们之间的差别和各个社会内部基于时间的变化。这两种研究方法有时被看成是相互矛盾的，但如果将它们看成是相互补充的，其实更为可取。法国历史学家库朗日则更进一步，坚持认为历史学是关于社会事实的科学，即真正的社会学。

进入近代以来，历史学的阵地大为收缩，只能固守对人事且基本是过去人事进行研究，此之外的所有领域大致都归为其他学科了，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如此。近代的学科虽然分工更为细致、门类更加繁多，其实都是由上述四大基本学科发展过来的。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考古学、社会学、新闻学等都由历史学派生而来。自然科学及其衍生而来的技术科学的科目虽然在当前为数不少，但在文艺复兴的时候，自然科学还是哲学的一个分支。

东西方不约而同地将人类精神文明成果裁定为四大基本类，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的暗合。依据人类对美、真、理、善四大基本的精神需求，它们只能分为四大类：人生

① 徐宝璜：《新闻学》，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 1919 年版，序言第 1 页。

② [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 页。

③ [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 页。

④ [英]W.C. 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上册），李珩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215 页。

于天地万物之间必有所创作，这是泛化的诗歌；为了让个人认知得以广播延续而对所察之象的描述，这是泛化的历史；用概念和逻辑对所遇疑难的解释，这是泛化的哲学；当三者都无济于事时，只能靠某些准则来约束人的言行，这是泛化的宗教。进入近代之后，中国的分类法逐渐向西方靠拢。考虑到中华文明的非宗教性和诗歌概念的狭隘性，以及诸多概念在当前的通行用法，把人类的四大精神文明成果分别命名为伦理、艺术、历史和哲学较为妥当。

表 1-1 基本知识分类法

知识分类 \ 分类者	知识类别			
	古代中国	经	集	史
笛卡尔	神学	诗歌	历史	哲学
对应法则	善	美	真	理
现代表述	伦理	艺术	历史	哲学

根据表 1-1 的分析可以推知，历史之外庞大的人类精神文明成果，按中国古代的分类法有经部、子部、集部；按笛卡尔的分类法有哲学、诗歌和神学。中西方对学问的基本种类的裁定可谓不约而同，实际上经、史、子集的确也大致对应着神学、历史、哲学和诗歌。用当前通用的概念来表述则是，在历史之外还存在着伦理、艺术和哲学三大基本对立的精神文明成果，也就是说伦理、艺术和哲学不是历史，历史是相对于它们而存在的一门基本学科。

二、史学的基础性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世间万物虽然纷繁复杂，但其源头确实单一的，就本质而言都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历史与伦理、艺术和哲学作为人类四大基本知识体系，它们也并非一种简单对立的关系，同时还具有内在统一性。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习近平主席所言高度地概括了历史学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主席在这里引用了司马迁的名言。司马迁是我国的“历史学之父”，其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历史研究者的理想和追求。司马迁的这句名言其实与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名的三个时段理论相吻合。布罗代尔是法国年鉴派史学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在其经典名著《地中海与腓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布罗代尔首次将历史时间分解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个

① 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人民日报》，2015-08-24（1）。